

4-2-3
5

574 2.128
15-20
周恩来同志五月十四日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九大”的极其重要的讲话

(录音记录稿, 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热烈鼓掌)

我们这次传达“九大”是总结了驻京解放军方面,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方面的经验, 采取一个比较短期会议的方式。“九大”的文件: 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林付主席的政治报告, 新的党章和九届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 全部登了报, 并且现在印在《红旗》第五期上, 你们大家每一同志都可以一读、再读、三读。如果我仍在这个地方再来唸它, 就浪费你们的时间了, 而且也不见得就能好好地听, 因为你们都晓得;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免了 (鼓掌)

第四个新闻公报就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 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 选举新的政治局和新的常委, 特别是选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同志为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 (热烈鼓掌) 这个新闻公报也在报上登了, 《红旗》杂志第五期有了, 刚^才谢富治同志也读了。

林彪同志在“九大”第二次全会上, 四月十四日的讲话, 大家就看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林付主席, 是怎么样的谦逊, 怎么样的谦虚, 这更值得我们热爱、支持和拥护。(鼓掌)

关于“九大”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三次讲话, 两次都是四月一号的; 四月二十八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刚才宣读了两次, 这个文本已经给每个单位都印发了多少份, 所以你们这个地方听了以外, 还可以回到机关上, 要你们机关分组来唸给你们听。(鼓掌) 所以原来准备读三次, 一看时间, 读一次就要半个钟头, 就免掉一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796076

796076

天，这也是当机立断的节约，还有一次，就是刚才谢富治同志念的，毛主席在四月十四日，在孙玉国同志讲完话的时候讲的一段话，就是在公报上说的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有许多同志要问，这个极其重要的又鼓舞人心的讲话到底讲的是什么？现在由谢富治同志给你们宣读了两次，还加上他的解释，这也可以说满足你们公报上的一切内容了。还有在四月十四日“九大”第二次会上有九个同志发言，刚才谢富治同志提到我的发言，还有另外你们知道的，公报第二号提到的八位同志，有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黄永胜同志、王洪文同志、陈永贵同志、孙玉国同志、尉凤英同志、纪登奎同志，八位同志的讲话都印发各机关，也可以由各机关分组来念，由他们宣读给你们听，这里就不要读了。（鼓掌），这又可以节约一部份时间（鼓掌）。

现在让我讲什么呢？我也宣读，宣读公报上没有讲的（鼓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开会期间，召集了一部份同志，就是“九大”的主席团秘书处十二位同志，这十二位同志，在公报上发表在前一列的；第二就是各大组。我们开会的时候，每个单位算一个小组，比如政府机关，这个单位，今天这么多人到会一万多人，代表我们政府机关组的是三十一位代表，加上十位军事同志，加在一起就是四十一位代表。大概今天绝大多数同志都来了吧！（鼓掌）刚才林江同志说他也是代表，有三位出差了，抓革命促工作去了，其他都到了。这是一个小组。“九大”一共有四十五个单位，每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推选出来的，通过党内外群众经过充分协商的是二十九个单位，比如北京市是一个单位，北京市的代表协商充分的，我们学了他们，我们政府机关的三十一位代表也是经过充分协商的，可能你们今天坐席的同志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参加

了拉票，是不是（鼓掌）另外，军队方面解放军方面有十一个单位，（十一个大军区）也选了代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加上十一个大军区，就是四十个单位，然后就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是两个：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在一起是五个单位，四十五个单位。分开来讲的时候就开小组会，有些小组很大，象上海，他的代表有八十多人，有时开会要几个组来开，先开小组会，有时候要交流彼此的經驗，便于总结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就开大会。大会是分六组，东北三省，还有一个军区，再加上空军就是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省区，再加上中央直属单位成为第二个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市，再加上济南、南京、福州三大军区，合在一起成为华东大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个省区，加上广州军区，就成为第四个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这些省区，加上兰州、武汉两个军区，还加上海军，这就成为第五个大组；云、贵、川、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加上昆明、成都两个大军区，还有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合为第六个大组，所以政府机关合在第三大组。这六大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每个大组推两个人，再从中央老同志中象董必武同志，还有其他的，也找出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六个区二六一十二，再加上两位，共十四位同志，加上“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同志，谈过两次比较深入的谈话，也谈过一次关于选举问题的谈话。我现在就把主席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介绍给大家（鼓掌）。这个谈话，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三日两次，内容有许多是继续阐明的，所以，我们把他合成一个内容来讲。当时没有录音，没有速记，各人记各人的，对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我们从北京市取得的經驗、各个单位传达的不完全一样。那么把他们所传达的再加

以整理，我今天传达的版本就比较好一点；但是，不敢說怎么好。

（鼓掌）我也仿照謝富治同志的方法唸，有时候加一点解釋。

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同部份同志的重要談話，就是剛才說的十二位加上十四位。四月十一日、十三日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各大組部份召集人的会议上这个談話，根据几个人的笔记初步整理，没有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审阅，所以这个传达，由我自己負責，如果說錯了，我負說錯了的責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头說，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組的簡报上說，现在有一种傾向掩盖着另一种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傾向，就是扩大化。在这个问题我談过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搞出来。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那么准，扩大化了，抓了一些人，不应该抓的也抓起来了。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意思，就是說，因为要抓敌人嘛，抓坏分子嘛，所以大家有一种同仇敌愾的心情，这种情緒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就提醒我们，我们政府各机关现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到掩盖另一种傾向，扩大化呀，逼供信呀，特別不许可的就是刑訊）

主席說：“一种主要傾向掩盖另一种傾向，这种事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党发展的历史。（因为不要只看到目前的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种傾向掩盖着另一种傾向，应该回顾我们整个的历史。这是主席跟大家談話的中心的關鍵。主席說过，历史上的經驗教訓要时时讲，多讲，跟大家讲，跟群众讲，才能防止以后不犯或者少犯这种錯誤）

主席說：可以看看我们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

— 4 —

在一九二三年开的，会议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就是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主席說：张国燾，刘仁靜反对国共合作，后来张国燾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靜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现在这两个人，我說一下子，张国燾跑到加拿大去了，要跟王明这个叛徒合作，搞他的黑党。刘仁靜是托派，他是中国的托派中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那么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主席說，三大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个主要倾向掩盖了独立性，独立自主，就是党的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矛盾，就是說的阶级矛盾，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既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许对它批评，对它斗争，如果要批评国民党那是不行的。（这都是讲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主席說，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头孙中山还在，既然合作，主要放在合作上去了，那时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至于打倒土豪劣紳，有的叫，有的就不叫，如当时湖南省委书记李維汉就不叫。（我說一下，所以他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高潮的时候，发生马日事变的时候，他仓惶逃跑）主席說，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广东的海陆丰，西部的广宁，广西省的东南等等的地方。（但是偏偏不搞軍队，軍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实权在国民党的軍閥手里，如果說，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一点軍队，一个就是叶挺的独立团，北伐的先鋒队，就是林彪同志在那个队伍里头。那个独立团发展成两个师，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南昌起义犯了錯誤，不坚持在农村中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而要去进入大城市，一直跑到汕头。第二个錯誤就是依靠外援，为什么到汕头呢？汕头是海口，根

据当时希望苏联，也得到当时的苏联代表的同意，要給軍火，可是打了败仗，軍火怎么得到啊。得到也没用，还会失掉，因为不是靠自己从敌人方面取来的。这是南昌起义两个主要政治上錯誤。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对反动的国民党开了枪嘛，就是跟他分裂了嘛，枪打反动的国民党，可是政策錯了，大方向保不住。一个是不到乡村中就地搞土地革命，搞农民武装；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依靠自力更生。所以我常常拿这个例子說服红卫兵。他们总是大方向对了，什么都对了。大方向对了，政策錯了，还是錯了，保不住大方向，这个历史教訓是有說服力的，但說服力还是有限，因为对我们來說是痛苦的教訓，对红卫兵來說，他也是差十万八千里，隔得很远了，所以，什么事情，主席都說，历史教訓讲得大家听，还得通过本人的实践。另外，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也就是所謂国共合作的政府嘍，形式上我们有两个部长，一个劳工部长，一个农林部长，结果不起作用。当时我们搞了个警卫团，这是第二个武装了，这个警卫团后来要离开武昌赶到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没赶上，后头遇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了（鼓掌）这个警卫团里头一位战士，就是一位兵，就是现在的參謀总长黄永胜同志（鼓掌）后来，南昌起义軍隊在广东失败了，可是有一部份軍隊没有参加那次潮汕战斗，结果呢？就能够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經過许多艰难曲折，上了井冈山，跟毛主席领导的軍隊会合了（鼓掌）林彪同志就在那里头，从那时起，林彪同志就一直紧跟毛主席（鼓掌）所以，我說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鼓掌）。毛主席說，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就出来了，所謂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是蔣介石、汪精卫，他们当办阶级是逐步起来的，不是一下子的，他们在群众做运动吓

坏了，我们党里头也有被吓坏的，南昌暴动，“八·九”会议，是八月七日，清算了陈独秀，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就是托洛茨基，陈独秀的取消派。（说一下，什么叫取消派，就是说，他取消我们当时所进行的武装革命，那时陈独秀跟托洛茨基一样的口吻，他们所谓的不间断革命，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国民党可以开国会了，我们应当放弃武装革命运动，进行参加议会活动，要准备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这种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这种理论，在一九二六、二七、二八年斯大林跟托洛茨基争论的时候，就批驳他的理论。在中国，瞿秋白变节分子，在当时“八·七”会议后，他也坚持这样的意见，就是说革命应该发展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广州暴动，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时候举行的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解释革命的性质要起变化了。这都是错误的。这即是“左”的，只是强调所谓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论，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这个革命的时候，早就说过，革命既是不断的，但又要分阶段，要把民主革命这个阶段基本完成的时候，才会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超越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就是一下子两个革命同时解决，不可能。所以陈独秀跟托洛茨基是一种“左”的、极“左”的口号，但他又掩盖另一个右倾的实质，因为他主张搞议会运动，承认民主革命使命完了，蒋介石要开国会了，这个事情，铁的事实，历史的事实，驳倒了陈独秀取消主义的理论，因为蒋介石从来没有开过真正的所谓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会，即使是骗人的，他也没有开，他只开了伪国大，选举了伪总统，中国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了，现在他躲在台湾，有时也开一开所谓伪国大，那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啊！那完全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要骗人哩，所以，当时我们恰他取名字

叫托陈取消派，这个是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陈独秀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就公开打起旗帜来，成立一个脱离、反对党的中央，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当时我们进行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当时红军的运动）主席说，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没有想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有人如刘少奇在武汉就交枪投降，群众运动都打下去了。（刘少奇的叛变材料都印给大家看了）那时的工人、农民运动，被一扫而光，有的地方打败了，如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只有到乡下去。既然打起来了，有的同志就想一切都打倒，不管什么买办资本家，还是民族资本家，都要打倒，也不管是工商业的小资本家，也要打倒，连城市的小作坊也要打掉。就是说，除基本阶级，工人，农民之外，一切都要打倒。农民中的富农也要打倒。资产阶级要分阶层，城市小作坊不该没收。对一些人来说，所谓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民主革命主要有两个区别：一个是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部份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是不触动民族资本家的。另一个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和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的富农不发达，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后来，“六大”（就是我们党的六大代表大会）也提出过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但是，“六大”没有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没有解决农村包围城市，没有解决革命重点移到乡村。我们住在乡村，也有小城市，大一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攻了两次，连赣州都打不开，才承认不能打赣州了。

（就是说，实践的經驗教训了我们，常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或者几次，碰得头破血出，才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主席說，內戰時期犯了三次“左”傾錯誤，为什么不犯右傾錯誤，只犯“左”傾錯誤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嘛，因为那个时候要打嘛，因为那个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嘛，国民党政府杀人嘛，我们拿起枪来对付国民党，眼睛杀红了，有些人就执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因此，出现了“左”傾路線的錯誤，主席說，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一次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第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線，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到八月，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是王明路線，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发现叛徒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名字叫《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維克化而斗争》。这个小册子說李立三的路線是右傾机会主义，因此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王明在莫斯科吹嘘中央苏区，就是江西、福建中央苏区，红军有五十多万，后来經過了长征，长征是因为我们在江西站不住了，要轉移战区，到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这个时候，王明还在莫斯科，大概他听到就舒服了，因为他吹了五十多万嘛！三次“左”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路線比瞿秋白路線厉害，王明又比李立三厉害，时间搞得长，損失大）主席說，內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如江西A B团的事件，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张国燾自搞一套。（我这里解釋一下，我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搞肃反运动，没有问题，反革命分子总是要在红军队伍里头，在我们根据地要钻空子，所以有许多根据地都发现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这是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嗎，有地主分子嘛，反动的国民党要派来敌探嘛。当时，在江西就叫A B团，A B团这两个字，就是反布尔什維克，ANTI — Bolshevik，用外国的名字就是A B团。这个头子就是国民党的，在五卅运动时很出风头的一

个头子叫段錫朋，是江西人，后来变成国民党反动头子，这是讲江西根据地嘍，如果就福建說，不叫A B团嘍，叫社会民主党。在鄂豫皖，就是謝富治同志那里，李先念同志那个地方，就叫改組派，是反革命嘍！在湘鄂西，在洪湖那个地方啊，（陈华堂在嗎？）也叫改組派，又叫第三党，在鄂豫皖，反正A B团、社会民主党、改組派、第三党，等等，是有这样的分子。但是搞得久了，就变成扩大化了，逼供信都来了。所以我们对于清理阶级队伍，肃反这个问题上，有很长期的、多次的惨痛的教訓。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經常教导我们，防止扩大化。在延安审干的时候，也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是在延安审干时最成功的一个政策。弄错了嘛，你还可以向他道歉，放了嘛，你如果捉得太多，很不利，杀了就更不利，因为没有弄清楚，总还得弄清楚以后，再处理嘛。就是处理应该少杀嘛，改造他嘛，劳动改造嘛，去生产嘛。第二件事，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当时出现了立三路綫，以后又跟着出现了王明路綫，党的中央犯了“左”倾路綫的錯誤，因此，就有一部份右倾思想的人，他不按照党的原則，在党内批判斗争，提不同意見，他分裂党，另成立一个中央。这个时间很短，可是把我们有一部份很好的同志，象林育南、李求实等等同志牺牲了，这些同志对“左”倾路綫是反对的，但采取了組織上的錯誤方法，原則，结果遭到牺牲，到现在我们还悼念他们。可是，这个头子罗章龙並不好，解放后，也是根据刘少奇那个叛徒哲学，他用了刘仁静，剛才說了，他見了他还給他做翻譯工作，也用了罗章龙，在武汉大学教书，当然，现在扣起来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张国燾，他那个时候是从鄂豫皖轉移到川北，那时四方面軍力量比较大。）主席說，张国燾不把方針正确与否做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万五里大

一方面軍小，出發的時候，一方面軍號稱八萬，到了跟張國燾會合的時候只有三萬，他一聽就看不順眼。（張國燾儘管他鬧了分裂，事情是很危險，當時毛主席帶着一方面軍隊伍北上，因為在毛爾蓋藏族區不能久停，那個地方人口極少，在一個兄弟民族地區，長聚那麼多軍隊不可能，必須要轉移北上，張國燾他就不贊成，要把毛主席領導的部隊扣留起來，結果呢，我們知道了，轉移北上了，張國燾就留在那裡，另外成立一個中央，但是許多同志反對他，後來又遇到任弼時同志領導的二方面軍，會合了，然後推動了北上，最後三個方面軍都在陝北會合了，這是最大的勝利，成為今天我們黨的領導骨幹（鼓掌）。三個方面軍會合，可是張國燾他那個分裂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不能不批判，他不干了，後來查明，他本人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在北京被捕的時候，他就向敵人投降過，寫過自首書。所以三個方面軍會合不久，抗日戰爭起來不久，一九三八年他就逃跑了，逃跑到武漢，投降了蔣介石，他帶了什麼人呢？一個也沒有帶，他是單人匹馬，馬也沒有，就是光杆一個跑走了。所以，誰要分裂黨，誰要叛變黨，結果就要落得象張國燾這樣的下場）主席說，羅章龍沒搞幾天，張國燾也沒搞幾天，以後注意我們黨不要分裂。主席又說，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算是犯錯誤的人，他們是王明那些二十八個半的人，但在蘇區吃過苦。（什麼叫二十八個半呢？在場的，有知道的，有不懂的。就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時候，鬧小宗派，跟當時的中山大學校長米夫勾結一起，米夫後來也不是一個好人嘍！只結合少數的人，二十八個，怎麼又半個呢？因為半個年紀太小，跟在後面走一走就是了，所以叫二十八個半。他們自己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別人統統不是布爾什維克，中山大學好像有一千多人，他只勾結那麼幾個人，就成為一

个宗派，后来四中全会，经过**米夫**支持，当然也由于我们当时在中央犯的錯誤，即中央委員犯了錯誤，所以，他就領導了四中全会，但是，这一伙人，最后都暴露出来了，王明就是这一伙人的头子。但是，虽然如此，主席还做了分析）所以主席說，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圍剿中帮过忙（就是国民党圍剿我們，在江西一共五次圍剿，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圍剿中帮过忙。）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出中委有困难。其实他们跟朱德、陈毅同志也差不多。朱德、陈毅、许世友同志說他们反了几十年，主席說，其中也有时候不反。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领导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但心里又不踏实，就跑到中央，找中央去请示，中央不答应，又请了毛主席回来。主席又說，随后就是项英。（项英，大家有的可能不大清楚，就是新四军的政治委員，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是个逃兵，皖南事变，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当时在江西的时候，项英也不敢指揮，又不主张打，跑到后方去。秦邦宪，张聞天到了苏区，在国民党五次圍剿时候，就搞得那一套“短促突击”就是拼实力嘛！总是听洋人的（那时一个洋人顧問，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叫李德，当然，我们还应该說，尽管那个李德是很坏的，现在在外国，他是德国人，在东德还反对我們，但是，当时中国领导同志听他的話，中国同志应该自己負責任的。我們犯了錯誤，因为这样）主席說，我們军队遭了不少灾难，至于王明，就是陈紹禹，他没有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因为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就到莫斯科去了，王运、农运从来没有搞过，也没有打过仗，粮食那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們这些人就成了“右派”。（王明的“左”倾路綫，統治了四年，使党的損失比前四次左倾路綫損失还大，許多根据地都失敗了，使我們紅軍根据地損失

了90%。白区的工作几乎完全垮了，所以，右傾路線，右傾机会主义路線当然不好。它要跟敌人去联合，甚至投降，但是，“左”傾路線也同样可以把革命断送掉的。）

主席又說，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一个浪潮，这个浪潮就是民族矛盾的浪潮，掩盖着阶级矛盾的浪潮，因为，民族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了，阶级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退为次要的矛盾了。因此民族斗争掩盖着阶级斗争。（抗日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那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更要紧了，但是形势不同了，对共产党有利了。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所以还是用的国共合作的名字。这一个民族浪潮掩盖着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掩盖了这个浪潮，应该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主席說，在一九三七年，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斗争降为次要矛盾。讲了这一些，然后又讲了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华北参加会议的刘少奇、彭真等那个代表团不赞成，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这个是有文献可查的，所以，希望同志们学一学毛主席的选集第一卷，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讲了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容；第二篇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就是在这个会议上的结论，题目叫《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两篇文章，就是讲这个民族矛盾跟阶级矛盾位置如何放，既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又要争取民主，这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群众基础。就是把这两个矛盾结合起来。一个是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一个是五月七日，你们可以查毛选第一卷上有，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下，再重溫一下，你們不要以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又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像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再出現了，不見得，如果一旦大仗起來了，我們要抗美，反抗蘇修，那個時候，一切主張抗美的人我們都要聯合，那是個民族矛盾處在首要地位了，但是不要忘記還存在階級矛盾。當然性質是相同的，但情形、力量對比等等都起了變化。）主席說，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王明回國搞了右傾投降主義，他以極“左”到極“右”，在王明回國以前，就有一種情緒，只要國共合作。王明回國以後，就領導了這種投降主義傾向，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獨立自主，不要發動群眾，不要擴大軍隊，不要搞根據地，不要黨的領導。他要回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錯誤路線。王明投降主義在局部地方興了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主席說的這個階段的历史事實，在王明回國以前也有一篇文章，在毛選二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日子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這是在王明回國以前就證明我們黨內就有了這個情緒嘍，抗日第一了，不講民主了。王明回來以後，加深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和路線的鬥爭。）主席說，領導機關是重要的。中央一直堅持正確路線，執行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但到一九四一年初，項英還未轉過來，皖南事變發生了，這是得到許多教訓的。打廬擦仗，在華北有朱懷冰、張蔭梧，還有鹿鍾麟，還有石友三。華中有韓復榘，有李仙洲。這些人教育了我們。（那個時候，抗日戰爭內部也發生武裝衝突，就是國共的武裝衝突，國民黨進攻我們，我們叫打廬擦仗。）主席說，我說，單是馬克思的教育還不夠，還不行，還要靠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來教育我們。總之，我們有些人過

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錯誤，右的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这就是一九四二年到四五年初，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錯誤。但是现在还有人說，整风是“錯誤”的，将来人家还会說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就这么讲嘛！所以主席預見到未来还会发生这样事情。所以在座的中年的，青年的同志，你们随时要记取历史上党的經驗教訓，警惕未来。）主席說“七大”，就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开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七大”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就是說，现在证明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但是，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关系，当时我们不知道。在这样一种傾向中，有的是跟着跑，犯了錯誤，但不一定是叛徒、特务。（就是說，现在我们提出的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我们证明了他们是叛徒，或者是内奸，或者是钻进来的異己分子，但是跟着他们跑的，跟他们走了一段时候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所以也要区别对待。）

主席說，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请我去重庆談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当时很紧张噢！我說的不是主席紧张，是我们这些党员们，整个解放区呀，特别是我们陪主席到重庆去的人，那是很紧张。“七大”以后嘛，全党团结去争取胜利，这个时候，我们主席到了虎穴里头了，你们說当时党员的心情，全国人民的心情能够不紧张嗎？但是，当时的形势决定，我们的伟大领袖掌握着时机，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离开延安的时候，在重庆的时候，就告訴当时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說，你们不要怕，如果蒋介石要挑起武装冲突，你们放手打，打得越好，倒反容易回来。（鼓掌）主席这样伟大的

唯物辩证的思想那是处处用的。就是主席在重庆的时候，我们晋冀鲁豫的部队，谢富治同志参加的嘛，就叫上党战役嘛，根据主席指示嘛，主席在重庆嘛，打了一个胜仗，把蒋介石部队打垮了，缴获了蒋介石的密令，叫他们进攻解放区，我们真凭实据都拿到手了，所以你把他打输了，歼灭了他就舒服一点了。主席不是说了，打掉一部，舒服一部，打掉多部，舒服多部，打完了，舒服完了。)(鼓掌)主席接着说，然后董老、总理去了，订了协议。(我们留在那个地方谈判了)蒋介石不算数。主席接着说，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延安党校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谈话的时候，林付主席插了一句话：“这个电报是给东北的，东北没有传达，我们发了个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不是和平民主的开始。”)(鼓掌)这就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识透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是要挑起内战的。谈判是假的，是幌子，说着听的，不兑现的；准备力量，把后方力量运到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的一些城市，把力量布置好了，然后打内战是真的，而叛徒刘少奇呢？在延安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在东北就抵抗了他的这个“指示”，这是一个错误的破坏我们革命的“指示”，这就说明，我们付统帅当时的英明判断。(鼓掌)主席说，协议不算数，蒋介石又打起来，三年多就把蒋介石打败了。(鼓掌)

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前，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地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报告，大家知道的很少啊！我们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但当时我们没有公开宣布，一直到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才宣布。有的